

村山妙喜寺碑銘石佚顏魯公集載文○宋謝公集宋次道以修

州西南村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

晉御壽光周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

陸羽茶文化研究

移於此山山

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村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

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村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

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週卽此山也其山勝絕游者忘

歸前代亦名稽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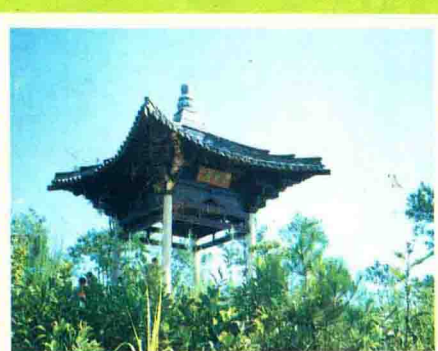
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村山西南

流號黃浦俗亦名黃鰲澗卽梁元祿卿江淹賦詩之

處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

美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

思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在古



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村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

於記中大歷七年真卿篆刻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

陸羽高祖部至州會於此山真卿遂於亭於東有陸羽



陆羽茶文化研究

第六期

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

浙出书临(96)第 134 号

1996 年 3 月出版

封面题字:郭仲选

封面设计:寇 丹

主 编:钱 朴

副主编:张西廷

编 委:丁克行 邵 钰 张西廷 林盛有
寇 丹 高万湖 钱 朴 蔡一平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总 校:任秀土

校 对:高年嘉 傅启成

地 点:湖州市湖升路湖州蚕种检验大楼内

邮 编:313000

印 刷:湖州市社科联印刷厂 厂长:凌 红 电 话:2023500

友好往来



◇日本茶汤学会副会长、神戸大学教授仓泽行洋（右二）于1995年4月来湖访问，与北京外语学院滕军（右一）、本会会长董淑铎（左二）、湖州对外友协副会长顾忠国合影。



◇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家元小笠原秀道（后排左二）一行于1995年8月访问顾渚山唐贡茶院遗址。

◇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友好访华团于1995年11月在湖州举行茶道表演。



目 录

茶文化研究

把茶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.....	董淑铎(1)
茶人、茶宴、茶道与湖州.....	戴 盟(2)
中国最早识茶的人物和地域.....	罗家庆(5)
再论湖州茶文化的特点.....	高万湖(6)
在长兴修复大唐贡茶院之我见	谢文柏(11)
试谈茶文化的社会功能	任秀土(15)
唐代茶文化与养生文化渊源初探	吕维新(19)
关于当前长兴紫砂茶具生产的思考	董建民(22)

陆羽研究

陆羽与《易经》	朱乃良(23)
论《茶经》的诞生基础	寇 丹(25)
论陆羽著《茶经》的社会背景	张西廷(31)
杼山考略	张葆明(33)
再谈认定杼山的依据	朱仰高(34)
湖州杼山的历史文化内涵	董楚平(36)
《六羡歌》和陆羽的终极关怀	徐 勇(37)

茶叶经济

论湖州开发茶叶生产的自然和经济技术条件	林盛有(38)
抗日战争时期浙西的茶市	朱仰高(41)
茉莉飘香话窖茶	蔡 争(42)
保特色重信誉求质量——森大茶号茶叶经营经验谈	程桂珠(43)
国茶出路的思考	蔡泉宝(44)

国际茶文化交流

- 《茶经》的故乡——湖州 (日)仓泽行洋 东君(47)
- 宇治——日本茶文化的故乡 彭 华(50)
- 日本煎茶道简史与现状 滕 军(52)
- 从挂轴、台子、天目碗谈日本茶道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章 莉(56)

茶德茶功

- 古经典籍论茶功 李师华(59)
- 崇茶与倡廉 沈楚琴(63)

壶艺天地

- 漫话壶艺 钱大字(64)
- 防风故国话茶具 钟伟今(68)
- 邮票上的壶艺 张运达(72)

青塘诗声

- 同国际友人寻访陆羽圣迹 董淑铎(14)
- 品顾渚茶感赋 钱仲联(18)
- 陪客探句两首 朱乃良(18)
- 乙亥仲夏同日本小笠原茶道访问团游茶山 钱 朴(81)
- 欢迎日本国小笠原煎茶道友友好访问团来湖州诗抄
- 湖州市诗词学会 许学东、张世英、周志虹、陈焕文、任秀土(74)
- 居壶之外,乐壶之中..... 费在山(75)
- 茶诗趣谈(续) 钱时霖(77)
- 阮元与茶 钱时霖(82)

三癸亭茶话

- 最爱家乡茶 许 晋(87)
- 简 讯——《鉴壶》一书出版 (30)
- 附:茶文化研究论著索引(二)..... 钱志远(88)

把茶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

董淑铎

目前,世界范围的茶文化研究活动方兴未艾,一浪高过一浪。在这个氛围影响下,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10月成立以来,本着研究陆羽、弘扬茶文化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,做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显著成绩。时轮飞转,转眼已过去了整整五年多时间,光辉灿烂的二十一世纪也已曙光可见。面对新形势、新要求,我们有义务、有责任进一步做好茶文化研究工作,为时代、为社会做出新贡献。

我觉得,在新时期,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围绕一个中心,做好两个结合,把茶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

“围绕一个中心”,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。我们茶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,都必须围绕“九五”计划的宏伟蓝图,有利于经济建设,服务于经济建设。

“做好两个结合”,就是研究与开发相结合,内勤与外联相结合。

研究与开发相结合:首先要做好研究工作。一方面,要认真贯彻“双百”方针,积极开展学术研究;另一方面,要坚持求实精神,认真考证陆羽及茶文化史迹。但研究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,“九五”期间,特别是在新的一年里,我们还必须做好开发工作,包括名茶、茶具的生产开发,茶文化旅游的修建开发,以及认真做好当地茶风茶俗的挖掘整理等工作。如果不与开发结合起来,学术研究也就没有生命力。

内勤与外联相结合:就是既要加强对对外宣传、对外交流和合作,更要加强研究会的自身建设。要继续做好与国内外、境内外有关团体和友人的联系、交流和合作,特别要与外宣、外事等部门以及书画、诗词等兄弟学会配合,加大外联的力度,以拓宽联系面,增加联系网络。要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多作工作,广交朋友,使我们的对外联系和交流工作能上一个新的台阶。“内勤”工作是外联的基础和保障。要通过发展会员特别是团体会员、健全组织特别是要尽快在县区设立联络机构,以及增强内部团结等措施,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。我会有大批热心茶事的专家学者,几年来,正是由于大家不计名利、不顾得失、廉洁正直、无私奉献,我们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。在新的形势下,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传统,齐心协力,团结合作,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我们相信,只要全体会员同心同德、共同努力,我会的工作必将有新的进展,陆羽茶文化研究必将进一步深入,并对湖州的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增聘: 丁力、滕军、章莉任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顾问

费国林、张瑞安、朱元更任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。

茶人、茶宴、茶道与湖州

(杭州) 戴 盟

茶人、茶宴(茶会)、茶道,这些提法,最早都产生在湖州一带,茶与湖州,为何如此有缘?因何情有独钟?本文试做一些探讨。

“茶人”一词,现在已相当流行。杭州、厦门等地,都有“茶人之家”;北京有“中华茶人联谊会”并出版“中华茶人”刊物;上海有“上海茶人科技经济发展公司”,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还有个“小茶人茶艺馆”,……。

据有人估计,按照广义的含义,如果包括专事茶业的人,与茶业相关的人,爱饮茶与热爱茶业的人都在内,全世界产茶的有 50 多个国家,饮茶的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,大约饮茶的人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,保守一点估计,“茶人”总要以亿计算。

“茶人”一词,历史悠久,究竟最早的出处在哪里?

初步考证是:“茶人”这个词,是由“古代茶圣”陆羽所提出,《茶经·二之具》中,就有“茶人负以采茶”句。(原文是:𣎵,一曰篮,一曰笼,一曰筥,茶人负以采茶也。”这些采茶工具,都是以竹编制,产于竹乡苕溪一带,是很自然的。)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在《茶中杂咏》十首中第二首的题目即为《茶人》,皮日休的一首,开头四句是:“生于顾渚山,老在漫石坞。语气为茶馥,衣香是烟雾。”这些都是写的“采茶人”。

大诗人白居易在《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》诗中末二句是:“不寄他人先寄我,应缘我是别茶人。”诗人很自负,对茶很内行,并提出了“别茶人”的概念,就是善于鉴别茶叶品质优次等级的行家里手。另在《山泉煎茶有怀》诗中:“坐酌泠泠水,看煎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,寄与爱茶人。”这样,“茶人”一词,在采茶之外,又有“别茶人”“爱茶人”等新的含义。

“当代茶圣”吴老觉农对“茶人”一词赋予了茶业工作人员的亲切称号。1937 年抗战初期,吴老在嵊县三界率领茶界进步青年,组织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,编辑出版了一本油印刊物,以《茶人》为刊名。后来吴老筹划建立的浙江茶叶部门,又编辑出版了铅印的《茶人通讯》。

无论在古代、在现代,“茶人”的名字都和浙江茶乡关系密切。早期的“茶人”一词,更与湖州一带直接或间接有关。陆羽的《茶经》,在苕溪一带写成。皮日休和陆龟蒙,他们生活在苏州、阳羨等地,活动到长兴一带,而诗中的“生于顾渚山”,更是指明是采摘紫笋的茶人。白居易曾在苏州做官,他的那首《夜闻贾常州、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》:

遥闻境会茶山夜,珠翠歌钟俱绕身。

盘下中分两州界,灯前合作一家春。

青城逆婢应争妙,紫笋齐尝各斗新。

自叹花时北窗下，蒲黄酒对病眠人。

写的是茶山境会亭，是品紫笋茶尝新，而自叹做“病眠人”，不能到会做“别茶人”、“爱茶人”而深深遗憾！

总之，“茶人”一词，早期的出现，都与顾渚、紫笋、湖州、阳羨等有不解之缘。

二

茶宴究竟起于何时，也难以考查。

据《茶经》所述，吴主孙皓大宴群臣时，对酒量小的人照顾，曾经赐茶以代酒。

《茶经·七之事》《吴志·韦曜传》“孙皓每餐宴坐席，无不率以七胜为限。谁不尽入口，皆浇灌，取尽。曜饮酒不过二升，皓初礼异，密赐茶_茶以代酒”。

又记《晋中兴书》：“陆纳为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，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，不敢问之，乃私蓄十数人饌，既至，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饌，珍馐毕具。及安去，纳杖俶四十云：“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奈何秽吾素业！”

孙皓与陆纳的两件茶事，虽未标明茶宴，但与以茶代酒，以茶待客，均有渊源。明确标明“茶宴”、“茶会”的有钱起的两首诗。

据《茶事拾遗》记载：“钱起，字仲文，与赵莒为茶宴，又尝过长孙宅，与朗上人作茶会。”这两首诗均编入《全唐诗》。

《与赵莒茶宴》

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

尘心洗尽兴难尽，一树蝉声片影斜。

另一首《过长孙老与朗上人茶会》

偶与息心侣，忘归才子家。

言谈兼藻思，绿茗代榴花。

岸帻看云卷，含毫任景斜。

松乔若逢此，不复醉流霞。

这种茶宴、茶会，二、三知己，人数不限，竹林下，小溪边，随遇而安，看云卷云舒，听蝉声起落，可以品茗论文，含毫吟哦，也可以无言对坐，忘言忘归，兴尽难尽，一种悠哉游哉，超凡脱俗的境界，什么流霞仙酒，都是难以比拟的。

钱起，诗人，又是吴兴人，唐天宝十年进士，曾任考功郎中、翰林学士等职，为大历十才子之一。

至于颜真卿在湖州举行过许多茶宴茶会，吟诗、联句，我曾写过《茶会、联句与楹联》（载《陆羽茶文化研究》第五期）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三

关于“茶道”，应该提到皎然的一首诗。皎然也是湖州人。本姓谢，字清昼，谢灵运十世孙。是诗僧，又是茶僧，是有文字记载的“茶道”的率先提倡者。

他有一首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

越人遗我剡溪茗，采得金芽爨金鼎。

素瓷雪色飘沫香，何似诸仙琼蕊浆。

一饮涤昏寐，情思爽朗满天地；
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；
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；
此物清高世莫知，世人饮酒徒自欺。
愁看毕卓瓮间饮，笑向陶潜篱下时。
崔侯啜之意不已，狂歌一曲惊人耳。
孰知茶道全尔真，唯有丹丘得如此。
这首诗可与卢仝的《茶歌》并美。

诗中讲到剡溪的香茗，越瓷的茶具，赞扬茶沫飘香，胜似仙液琼浆，包含了对茶叶的观察，茶具的洗涤、欣赏，茶沫、茶汤的嗅闻等等，然后才提到饮茶。一饮、再饮、三饮，赞誉茶的清高，远非酒能相比。那种返朴归真的情趣，茶禅一味的情调，“茶道全尔真”，那种无我的境界，崔侯饮后，心旷神怡，不能自制，狂歌一曲，狂放惊人，这种率真的表现，只有神仙才能达到的妙境。这种以诗的语言，表达品茶的韵味，可算是粗具茶道的真谛，开后来茶道各派的先河！

既然是茶僧，又是诗僧，与当时的颜真卿、陆羽等往还，并与张志和、李季兰等羽客、道士相交，使茶与儒、茶与禅、茶与道互相渗透，提出一种“全尔真”的“茶道”精神，是颇发人深思的。

上述的茶人、茶宴、茶会、茶道……与湖州的“茶缘”，远非巧合。（当然，也不排除由于《茶经》的记载，陆羽等人的见闻所及，难免有些局限等因素）湖州确是唐代茶文化的一处重要的摇篮，比之宫廷“茶宴”（如李郢《茶山贡焙歌》中所说的“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”），更具有民间特色。

当然，在唐代其他地方也有举行茶宴的，如吕温有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：

“三月三日，上巳禊饮之日也。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。乃拨花砌，爱庭阴，清风逐人，日色留兴。卧惜青鸾，坐攀香枝。闲花近席而未飞，红蕊拂衣而不散。乃命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，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。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……”

这种以茶代酒的“茶宴”、“茶酌”，在唐代虽未普遍流行，在部份人中也是提倡的。

因此，我联想到当前的倡导茶为国饮。1994年12月18日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、浙江上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商会浙江省茶叶行业商会，共同在新落成的上虞绿洲山庄，举办了“倡导茶为国饮研讨会”，倡导茶为国饮，弘扬茶德茶风。中国是茶的故乡，茶德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之一，以茶为国饮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程。

希望湖州市在弘扬茶文化、提倡茶为国饮方面，多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中国最早识茶的人物和地域

罗家庆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列举了我国古代识茶的人物,如神农、周公旦和晏婴等,表明了我国最早发现、利用茶叶是在 4000 多年前。他引《神农食经》说:“茶茗久服,令人有力悦志。”他引《尔雅》说:“槲,苦茶。”他引《晏子春秋》说:“婴相齐景公时,食脱粟之饭,炙三戈、五卵、茗菜而已。”但是,有的学者认为陆羽引用的著作,都成书于汉代,况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,我国西北古代气候虽较温润,但历来不产茶,那么神农氏怎能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。”他们认为我国的茶事较迟,以致外国人趁机制造中国茶叶来自印度的说法。后来事实证明印度古代无茶。

早在秦汉以前,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。西汉时,茶是四川的特产,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。原来我国古代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展地,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。神农氏是“三苗”、“九黎”部族之首领。在《史记·吴起传》与《说苑》等古籍中有“三苗氏,衡山在其南,岐山在其北,左洞庭之坡,右彭蠡之川”的记载,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,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。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,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,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。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,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。

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,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,前几年已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。大禹接位,并非一帆风顺。他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,疏流入海,导苕溪、余不溪入太湖,克服了洪水之患。后又逐渐北上。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,就让他位于他。而“三苗”后裔不服,所以,《史记五帝本纪》有“三苗在江淮,荆州数为乱”的记载。大禹治水在江南,史书也有根据: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曾“上会稽、祭大禹”;司马迁 20 岁时,也曾“登会稽,探禹穴。”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。夏禹原让位于“百虫将军”伯益,但为儿子夏启夺权。启有太康、仲康和少康三子,不断发生王位之争。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,国力强盛,他曾率部南下寻根,至浙西、驻毕金斗山东南延妙峰一带,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。当时在山南建避它城、夏王村,杼留下部分人员后北返中原。夏杼之后八代而衰,履癸(桀)为契灭,契建立先商世代。

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,氏族社会“三苗氏”生息之地,产茶历代不衰,如南北朝时,《刘琨购茶书》中提到安州(今湖北安陆);《桐君录》中提到西阳(今湖北黄冈东)、巴东(四川奉节);《荆州土地记》中提到武陵(湖南常德),都盛产茶叶。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、南漳,四川彭景、安景,邛崃等地盛产茶。陆羽《茶经》中对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。由此可见,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的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”的事应发生在我国中原。即使从王褒《僮约》所记载的饮茶、卖茶的事实看来,我国汉代以前,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。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,从自给自用到“产、供、销”的过程,需要多长时间。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。

再论湖州茶文化的特点

高万湖

在《湖州茶文化特点试探》(见《陆羽茶文化研究》第四期)一文中,笔者曾从历史和意识形态——主要是美学意识两个方面作了一些探讨。现再就地理即湖州茶文化的空间结构和民俗方面,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,以期研究湖州茶文化的兴衰及振兴提供一点多向的思考。

文化区域是一个地域概念,就文化的空间结构而言,它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类型或模式的地理区域。虽然不同文化区的划分,可以用语言、宗教、民族等其它原则,但就湖州茶文化而言,它是与杭州茶文化、上海茶文化、巴蜀茶文化、荆楚茶文化等等相对而说的,不是与汉族茶文化、藏族茶文化或佛教茶文化、儒家茶文化来说的。因此作为地理区域的湖州茶文化,它具有不同于巴蜀、荆楚、北京、上海等其它地方茶文化的地理特色。

湖州的地理特色是什么?茅盾在《大地山河》一文中说得好:江南的特点并不是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”,而是水乡。湖州正具有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,唐湖州刺史、诗人杨汉公称之为“水晶宫”。明诗人孙蕡在《湖州乐》一诗中描写湖州水乡的特色是:

“湖州溪水穿城郭,傍水人家起楼阁。

春风垂柳绿轩窗,细雨飞花湿帘幕。

四月五月南风来,当门处处芰荷开。

吴姬画舫小于斛,荡桨出城沿月回。

菰浦浪深迷白纻,有时隔花闻笑语。

鲤鱼起风燕飞斜,菱歌声入鸳鸯渚。

(见《明诗别裁集》)

这种傍水人家午夜梦回可以听到橹声欸乃的情景,岂只是茅盾先生说的北方人难以想象,就是巴蜀、荆楚之人听到也会摇头不信。正是这种地理特点,才使湖州茶文化带有水乡的气息和芬芳。

茶与水、与河流本就有密切关系。由于古代水道是主要的交通路线,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,因而茶市——甚至城市的兴起及繁荣都与河道有关。巴蜀及北方自然也有河道,如现有史料中最早的汉王褒《僮约》中提的“到武阳去买茶”的武阳(今四川彭山县双江镇),就处武阳河与成都府河两河汇合处。“水门向晚茶商闹”(唐王建《寄汴州令狐相公》)的汴州(今开封),茶市也曾兴盛过。然而与江南水乡的河道纵横、湖泊成群、水网密布、航运极便相比,那就无法说了。笔者在教学时曾向湖州学生讲起,重庆虽有两条大江,但抗战时曾有过居民饮用挑上来的江水要以黄金论价的事,学生都摇头不信。水乡人是难以想象巴蜀那种航道险阻河岸陡峭望江兴叹的情景的。

由于水乡航运方便,文人雅士坐在船上,游览秀丽的茶山风光,欣赏动人的歌舞春色,品尝香嫩的春茶,那的确是神仙似的美好生活。诗人们就是这样歌咏的:

“何处人间似仙境，春山携妓采茶时”（刘禹锡《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》）

“笙歌登画船，十日清明前。”

“山秀白云腻，溪光红粉鲜。”

“欲开未开花，半阴半晴天。”

“谁知病太守，犹得作茶仙。”（杜牧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，因呈宾客》）

“山实东南秀，茶称瑞草魁。”

“溪尽停蛮棹，旗张卓翠苔。”

“泉嫩黄金涌，芽香紫壁裁。”

“舞袖岚侵涧，歌声谷答回。”

“重游难自克，俯首入尘埃。”（节自杜牧《题茶山》）

“采茶溪路好，茶影半浮沉。”

画航僧同上，春山客共寻。

芳新生石际，幽嫩在山阴。

芳貽千里外，怡怡太府吟。…… 姚合《寄扬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》

不仅文人雅士，就是水乡小孩唱的儿歌，也与巴蜀等其它地方小孩所唱有异。

“摇摇船，

摇到外婆家。

外婆出来留吃茶，

娘舅上山采枇杷。”（节自顾颉刚《吴歌甲集》）

笔者是川东人，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唱的就不是吃茶，而是：“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糖一包、果一包。”

至于劳动人民，水乡的农民可趁航船每天到镇上去吃茶，上午九点左右去，下午一点左右返回。据说南浔镇“每天进镇航船约500艘，约有1万5千农民上街，进茶馆吃茶约七八千人。湖州地区如南浔样大城镇有六处，其它中小集镇50处，每天进茶馆吃茶人数约计有15至16万人。”（见张葆明《抗战前湖州地区城镇市民茶事活动概况》、《陆羽茶文化研究》第五期）巴蜀荆楚地区多山，交通不便，农民大多自己上山采摘野生茶叶，吃所谓“老叶茶”，只有逢赶集的日子，三天（或逢1、4、7，或2、5、8，或3、6、9）一次爬山涉水到集镇上去吃茶，因为时间紧，不少人只能在茶馆吃所谓“过路黄”或人家的“施茶”。“过路黄”是吃茶人已走而茶馆还未将茶碗收起的剩茶。只有集镇的市民，有闲阶层者才有福气整天泡在茶馆里，一碗茶，从早上一直吃到中午，有的甚至要保留着，直吃到回家吃晚饭时。但比起上述所说的如南浔那样浩荡的吃茶队伍，那就差之千里了。

茶之外，各地都有以其它植物代茶的，或谓之茶外茶。普通人家有用紫苏、薄荷、桑寄生等代茶的，富人家则以参代茶。湖州则有莲芯茶，即用莲子中的芯叶代茶。湖州水乡的迷人景色之一就是家家蚕桑，处处荷塘。正如苏轼所咏的“环城三十里”、“蒲莲浩如海”（《泛城南会者5人，分韵赋诗得“人皆苦炎”字四首》）；清乌程女诗人汪瑾所咏的“溪分前路合，桑密晚烟深”（《从苕返德清》）。湖州茶歌中也有咏唱莲花蚕桑的，如流传长兴的《芽茶盅赞》

泡茶之人年千岁，端茶之人有寿长。

白叶茶花黄灿灿，茶歌泡开地狱门。

茶盅上面长金花，茶盅下面结莲花。

要保老者增福寿，要保小者自聪明。

年年蚕花廿四分，茧似银山丝如云。

要保田禾多青青，合家五谷尽丰登。

这首歌虽然赞的是茶盅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茶人对丝绸之府渔米之乡的祝愿。湖州茶事谚语中也有“蚕是白老虎，茶是黑老虎”之说。（见钟伟今《湖州茶事谚语》，《陆羽茶文化研究》第五期。上述茶歌也转引钟伟今所辑的茶事歌谣）

湖州还有一种熏豆茶，它虽然不是茶外茶，但它是以熏豆为主，还加上橙子皮、芝麻等佐料，茶只是点缀性质而已。由于熏豆是用青毛豆肉加盐煮制而成，它是一种咸茶。就西部食盐较贵重的地方而言就不宜，因而它也具有地域特性。

湖州茶文化的另一特点是：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越文化的某些特征。从文化系统看，湖州茶文化与湖州丝绸文化、饮食文化等一样，它是整个吴越文化的一部份，因而在民俗方面都烙上了吴越文化的印记。这里须说明一下，吴越文化并不是指古代吴国、越国的文化，而是指吴越地区从远古到现在逐渐发展积累的文化。历史的长河是不能切断的。文化的发展，社会意识形态，虽然是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迟或早地变革，但也还有个批判继承的问题，而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态度。比如湖州的民间信仰和习俗，是在吴越地区的地理生态条件下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中，长期逐渐形成的，因而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。尽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会不断有所更新、有新的成份增加，进行新的包装，但其内核，则仍会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。如晋代陆纳以茶待谢安，至今湖人以茶待客的习俗还是较流行。即使迷信落后的东西，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，信鬼信神就是一例。

在古代，民间的信仰和习俗，是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决定的。远古时代，生产力不发达，人们不能正确的解释自然现象，因而产生对自然物的崇拜。对茶的认识如何？上古的不知，虽然《茶经》说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”，但神农在尝百草之后，对茶的评价也不明确。古无茶字，《正字通》引《魏了翁集》谓，茶字始为荼字，陆羽以后则易荼为茶。实则据《汉书年表》，汉时已有荼茶两字。《诗经》里有“周原朏朏，董荼如飴”（《大雅》）“采荼薪樗”（《豳风》）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（《邶风》），“有女如荼”（《郑风》）“以薺荼蓼”（《周颂》）。但前三句中“荼”，学者释义为苦菜，今无异义，后二者为别种植物。亦有人据后者认为荼非苦菜，乃秽草。荼有多种。《茶经》谓“一曰茶，二曰檟”，檟，《尔雅》释为“苦荼”，荼檟之荼才是汉以后的茶字。对檟荼的评价，《尔雅》也只是说可作“羹饮”。直到唐代，饮茶之风盛行后，人们才对荼有了较深的认识。荼从本质上说，是饮料，但它是怎样的一种饮料，陆羽给予了正确的回答。《茶经》开宗明义以定义形式描述其本质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嘉，有四个意义：《尔雅》谓“美也”，“善也”，“乐也”；《汉书·礼乐志》“休嘉砰隐溢四方”。《辞海》释为“吉庆、幸福”的意思。据此，对《茶经》的意思似可译为：茶是一种产于南方的美好、有益、给人乐趣、吉祥幸福的植物。荼与水、酒等不同，它不是一般的饮料，皎然称之为“琼浆”，杜牧称其为“瑞草魁”，宋代德清诗人吴潜叫它“龙芽凤草”。

因为茶是吉祥物，故吴越习俗用于待客、喜庆祭祀、驱邪避灾。

吴越蚕桑之乡，在杭嘉湖一带有关养蚕的习俗很多。茅盾先生《春蚕》中的蚕农老通宝就是一个典型。这种习俗缘于上古人们对生产物的崇拜。敬蚕神马头娘（晋干宝《搜神记》），小满节祭祀蚕王，立蚕之庙，清明游含山会的“轧蚕花”以及“蚕关门”、“蚕开门”的种种禁忌，这些习俗都是祈求蚕花的丰收。茶是吉祥物，农民把蚕卵撒在布片上，泡上浓茶，喷在这些布片上以保平安，叫“撒播种”。

吴越水乡多鱼蛇，故古越人以蛇为图腾。《史记》和历代《湖州府志》都有吴太伯奔荆蛮断

发文身,建立吴国的记载,此后才有菰城、乌程、湖州的历史沿革。“文身断发,以避蛟龙之害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。闻一多先生认为:“我们疑心创造人首蛇身始祖的蓝本,便是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自身。当初人要根据图腾的模样改造自己,那就是我们所谓‘人的拟兽化’。”(《越人对蛇的崇拜源流考略》)从出土的“印纹陶”的纹饰图案看,也有类似蛇的花纹的。故吴越地区对蛇的崇拜和禁忌的习俗很多,如认为家蛇是仓龙,是看家的,家蛇搬家家要败。湖州、安吉、嘉兴等地,当家蛇出现时,不但不能打,还要用茶叶拌上米撒向它,因茶叶是吉祥物,“茶叶米”能消灾保平安。宁波地区有人生病,也用茶叶、酒、鱼、肉、香烛等祭供以戒晦气。

因为茶是吉祥物,故过年祭祖时,有的供茶,有的用糖茶鸡蛋。农民春耕插秧时,杭嘉湖地区都有用茶和菜祭“五谷神”的活动。在德清武康防风古国一带,历来就把熏豆茶作为祭祀的供品。

茶既是美好、有益、给人乐趣、幸福、吉祥的饮料,又是传达情谊,沟通信息的一种载体或手段,因此它与人的一生都结下不解之缘,从湖州吴越地区的习俗看就可以明了。

人一生下来,各地风俗都很重视满月,都有一套仪式。吴越地区大都要喝满月酒,送贺礼,要给孩子剃头,有的地方还唱《满月理发歌》,而且要娘舅抱着剃。湖州则用茶汤剃头开面,谓之“茶浴开面”,以保长命。成年时要做生日,湖州则是十六岁时做,要设宴请客、敬茶。找对象时,父母招待女儿的男朋友吃茶,谓之“毛脚女婿茶”。正式结婚时聘礼叫“茶礼”,如“花花彩轿门前挤,不少欠分毫茶礼”(清孔尚任《桃花扇》)。聘金叫“茶银”,如“母亲写下婚书,茶银五百亲收”(清袁于令《西楼梦》)。接受聘礼谓之“吃茶”,如“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,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”(《红楼梦》)。湖州婚仪中,拜见长辈时,小的要敬茶。出嫁后,父母望归(看望出嫁女儿)时,“要随身带上一两左右的谷雨芽茶,半斤左右烘豆,二两左右橙子皮拌黑芝麻,在亲家家中冲泡,这种茶叫“亲家婆茶”(蔡泉宝《陆羽遗风》)。新媳妇婆婆请乡邻亲友吃的茶叫“新娘子茶”。

在成年人的生活中,旧社会有闲者整天一杯茶在手,所谓“白天皮包水”也;穷人也可吃到富户人家在寺院“建会设斋,又神圣诞日,助缘设茶汤供众”(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)的茶汤。为生活奔波的行路人,可在过路凉亭或好心人的门前饮口为你提供的“施茶”。你要经商,就到茶馆(名茶楼)去参加茶会——商人在茶楼进行交易的一种集会。不要走错地方,因为历史上“各行各业都有其约定的茶楼作为集会地点”(《辞海》)。如果你是诗人文人,那就参加以文会友的另一茶会吧。如果有人组织,还备有糕点,那你参加的是“茶话会”。如果你想听点曲艺、评书,就到茶馆去,在乡镇上,茶馆就是茶艺结合的演出场。你总会碰到亲友吧,在家中你自然要以茶待客,在街上总是到茶馆去坐坐谈谈。一边饮茶一边谈,如此谈话,古人叫“茶话”。如果与人发生矛盾,闹得难以解决,就到茶馆或其它地方找调解人说理评判,湖州叫“吃讲茶”。

在茶馆吃茶,你还要注意一些规矩和习俗,各地不同。湖州的旧规矩,据张葆明先生介绍:“两人进店可同饮一壶,三人却要泡两壶。将壶盖翻身盖上则是表示这茶请保留,还要继续饮。堂倌添茶水时,茶客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相并在桌上点两下,代表磕头表示谢谢。新年的早茶,加上青橄榄,叫元宝茶,茶客要多给小费。解放前,青帮、红帮等社会帮派组织往往在茶馆进行联系及活动,而它们坐茶馆时又有特定的符号暗语。如青帮规定将茶碗盖揭起,在茶碗口沿上刮三下,表示问候。将茶盖仰放,表示要寻求帮内的人。在川东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:一个大学生因探友偶坐茶馆,无意中触犯了红帮坐茶馆时饮茶的规定,差点被暗杀,幸得其亲友解说求情才免于难。这自然不是茶文化中的习俗,它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也就被扫

除了。但它属于旧社会茶馆的功能问题,并涉及各地茶馆文化的特点,故此提及。

当走完人生途程时,本人或其亲属还要考虑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吃茶问题。在去世前,吴越地区都有做寿材(预先定做的棺材)的习俗,也称喜材。江苏做喜材时还唱仪式歌(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·江苏卷》):

做过喜材冲过喜,消灾却难去晦气;

三茶六饭吃下去,百病全无身康健。

这是想以做棺材来消灾,好继续享受现实的三茶六饭生活。如果愿望不成呢,湖州《贤惠姐姐烧壶茶》这首民歌(钟伟今《湖州茶事歌谣》)中说:

肚子饿了上把抓,好似地下啃土蜡。

隔壁有个贤惠嫂,烙个油馒头烧壶茶,

死在阴间记住她。

烧壶茶吃,这本是平常事,可死后却记住,这是穷苦人民对生活的强烈要求,是对现实社会的血泪控诉。这不是追求生活美的品茗,而是人的生存的最低要求。这壶茶里有着对好人的颂扬,对旧社会的绝望与诅咒,自然也反映在阴间“对茶的纪念”。死者的亲人在安排后事时,吴越地区都很周详,湖州人要给死者烧黄表纸或锡箔做的元宝,就是好让死者在那个世界里喝茶吃饭时有钱开销。正如白茆地方丧歌中唱的:

一个弥陀一支香,一盏红灯照亲亲。

照得吾俚亲娘路上慢慢行,

逢着茶馆就吃茶,

逢着饭店就吃饭,

逢着庙就烧香。(转引自姜彬《吴越民间信仰民俗》上海文艺出版社)

湖人饮茶上的一些习俗,体现了吴越文化的一些特点,也是湖州茶文化的特点。但一个区域的文化不是封闭的,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和以绍兴(古越州)为中心的越文化,也是相互融合的,湖州在地理上正是这两种文化融和的交点。大而言之,吴越文化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也是互相渗透融合的。因此湖州茶文化的一些习俗与巴蜀、荆楚等其它地方的茶文化也有相通相似之处,可谓大同小异吧,如以茶待客,用于喜庆、祭祀、避邪等。说也巧合,作为古茶字的茶,其义之一是神名,即神荼。《山海经》记有传说,神荼与于垒兄弟二人是专捉鬼的,巴蜀荆楚与吴越各地贴在门上的门神就是。

有人说浙江茶文化的中心或重点在杭州,湖州是丝绸文化,绍兴是酒文化。近来,上海也在重视茶文化,而北京又在掀起饮茶热。明清以来,湖州茶文化渐衰,而杭州代之而兴,这是事实,是地理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。但湖州茶文化毕竟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及丰厚的现实基础。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,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,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能决定的。湖州、杭州、上海茶文化各有其特点、优势,如能扬长避短,发扬其特色,则湖州茶文化的振兴还是前途光明的。

在长兴修复大唐贡茶院之我见

谢文柏

一、大唐贡茶院的历史和现状

唐代第一所官办贡茶院，座落在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麓。贡茶院初建于唐德宗大历五年(770)，占地约3亩，建筑物分三进、30余间，掩映于翠竹间；朝向太湖，金沙泉涌流其侧，明月洞横亘其前，旁有清风楼、木瓜堂，息躬、忘归诸亭，南与峰峦叠翠的虎头岩遥遥相对。在1200多年前，每逢春茶季节，顾渚山下张旗立幕，水口草市①画舫遍布，州县官吏携使而行，丝竹歌舞飘逸空谷，正是李郢在《茶山贡焙歌》中描述的“春风三月贡茶时，逐尽红旌到山里。”

据长兴方志记载，在唐广德年间(762—779)，茶圣陆羽在阳羨(今宜兴市)与常州御史大夫李栖筠品尝了顾渚山的野茶，认为该茶“芳香甘辣，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。”于是遂列为贡茶。据宋嘉泰《吴兴志》载：“顾渚与宜兴接，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，遂命长兴均贡。大历五年与宜兴分山析造，首有客额，鬻有禁令，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，以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”；“长兴有贡茶院，在虎头岩后，……自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六年(800)于此造茶，急程递进，清明到京(今西安)，……十七年，湖州刺史李词，以院宇隘陋，造寺一所，移武康(今属德清县)吉祥寺额焉。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，两行置茶碓，又焙百余所，工匠千余，引顾渚泉亘其间②。”由此可见，自唐大历五年顾渚紫笋茶开始入贡，“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”，这说明贡茶之时也是贡茶院建立之时；而30年后的贞元十七年，由于紫笋茶贡额的增加，贡茶院设施“隘陋”，李词作了改建(改为瓦房)，规模比原先要大，同时说明贡茶院为什么又叫吉祥寺的原因。因贡茶制作时间只有一个多月，房屋大部分时间空闲着，为此，地方长官将武康吉祥寺的匾额移在贡茶院，并由僧人负责主管。时间长了，民间只知有吉祥寺而不知道这是贡茶院。

贡茶始于周初，盛于唐。唐初贡于武德三年(620)，时为民贡，亦称土贡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鼎盛时期，民康物阜，各业兴旺，其中饮茶之风尤盛，茶叶生产也空前发展。到了中唐代宗时，全国名茶辈出，被列为贡茶的有14种之多，而湖州长兴的顾渚紫笋茶，在唐代贡茶中最负盛名。据史料记载：③紫笋茶初贡时为500串(一串约一市斤)，至建中二年(781)进3600串；会昌中(841—846)增至18400串。时每年清明前，皇帝下诏，在立春后四十五日，湖、常两州刺史亲自到贡茶产区“修贡”。湖州刺史袁高在西顾山石刻中写道：“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茶……”；刺史杜牧在《茶山诗》中称：“剖符虽俗吏，修贡亦仙才”，“好是全家到，兼为奉诏来。”显然，贡茶院是在皇帝的诏命下，地方长官为完成大贡额、高质量的贡茶而建造起来的，集领导、研究、加工为一体的官方单位。同时，为了协调湖、常两州共同完成贡茶事务，在宜、长两县交界的悬脚岭，建造了一座“境会亭”(遗址尚存)。每年春季，两州刺史相会于此，品茗、赋诗、斗茶，盛况空前。由于顾渚山风景秀丽，贡茶院等设施齐全，曾到过顾渚山的湖州刺史有颜真卿、袁高、于頔、张文规、李词、杨汉公、李郢、裴汶、裴充等24名之多；还引来了无数墨客骚人，像陆羽、皎然、张籍、皮日休、刘禹锡、陆龟蒙、孟郊、郑容

等,留下很多诗篇和石刻。

大唐贡茶院由刺史督贡的记载自大历五年至大中五年(851)连续作贡 80 余年,现保留有贡茶时的摩崖石刻 9 处。这可以说是大唐贡茶院的全盛时期。以后时贡时断,至宋代,初罢后贡;元时改贡茶院为磨茶院,元末贡茶 2000 斤。明洪武八年(1375),被朱元璋所罢,仅贡芽茶二斤,永乐二年(1404)增加到 30 斤。清顺治二年(1645)知县豁免。紫笋茶作贡的历史共有 800 多年。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,吉祥寺仍有贡茶院的匾额,1949 年春,吉祥寺失火焚毁,仅留下遗址。1984 年县人民政府将贡茶院遗址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二、大唐贡茶院在中国茶文化中的历史地位

1、贡茶院的建立,是中国贡茶史上最早由民间土贡改为官方贡茶的转折点。因长兴产的紫笋茶、金沙泉被皇室认为品质特佳,深为重视,曾规定凡贡茶,以紫笋为主,并派太监到阳羡设“茶舍”,在顾渚山建“贡茶院”,专为督造贡茶、品尝和鉴定茶叶的质量。唐德宗贞元五年(789),将长兴贡茶分为五等,一等为“急程茶”,限清明节前到京,赶上一年一度的“清明宴”;其他四等也规定农历四月由水陆两路运长安。所以贡茶院的地位是由贡茶——紫笋茶(包括金沙泉)的地位决定的。由于皇室对紫笋茶的重视,或者说偏爱,此贡不再由民间土贡,改由州、县一级地方长官亲赴茶区,坐镇贡茶院“修贡”。在名茶产区建立贡茶院,实际上是一座“皇家茶厂”,并由州官来“督造”,这是中国贡茶史上的首创。

2、贡茶院的建立,提高了贡茶的质量,也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。在贡茶院集中了千余名茶叶加工工匠,将万余人上山采来的鲜叶(实为芽),经夜以继日的“选纳”,而后进行蒸、捣、拍、焙、穿、封、干等七道工序,再由州官“拜章上表”,龙袱包裹,派驿骑快马加鞭,十日内飞送长安。由此可见,贡茶院对加工贡茶的质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湖州刺史裴充,因“贡不得法”而被罢官。

唐李肇《国史补》云:“风俗贵茶,茶之名品益出。”由于天子好名茶,王公大臣、名人雅士纷纷效之,带动了全国追求用茶的“名牌意识”,特别是茶人,饮必名茶,水必名泉。一时间,名茶量少价昂,这给茶农带来了可观的收益,刺激了茶业的发展。当时朝廷开始实行茶税制度,从而给国家开辟了税源。据考证,唐建中元年(780)全国产茶高达 100 万老担(约 10 吨),产值突破 400 万贯,茶税收入高达 40 万贯^①。可见贡茶院的产生,是建立在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。

3、顾渚贡茶院的建立,也是贡茶与佛茶的有机结合。唐宋时期,佛教已进入全盛时期,寺院经济得到高度的发展,随之佛茶生产也已形成一定规模。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,凡风景优美,气候温和,光照充足,云雾缭绕的名山胜地,一般都有古寺名刹。僧人则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,大种茶树,“佛茶”也就产生。到了中唐时,全国崇尚饮茶之风,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:浙江普陀山、四川峨眉山、山西五台山、安徽九华山以及(四川)蒙顶天盖寺等寺院,都已产了名茶,且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。而唐贞元十七年湖州刺史李词重建贡茶院时,为了保护贡茶院的建筑、设施和茶园,将武康吉祥寺的牌子移至贡茶院,并允许僧人居住院内,实际上贡茶院出现了一座院子“两块牌子”,这是贡茶与佛茶合一的范例。如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据明、清时的长兴方志记载,只有吉祥寺(贡茶院)和尚提供的少量春茶,才保持唐贡紫笋茶的特色。

4、贡茶院是对外交流,传播茶文化的发源地。“茶神”陆羽在完成《茶经》著作前,曾多次到顾渚山考察,撰写《顾渚山记》两篇,并推荐紫笋茶、金沙泉作贡。《茶经》初稿约成书于唐永泰元年(765),其后有所增删。显然《茶经》成书早于贡茶院创建前五年,所以贡茶院的采茶、